我国满文研究的发展概况

关嘉录　　佟永功

满文，是满族在历史上使用过的文字。满文是在满语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满语又是由女真语发展而来的。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齐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获得迅速发展，与明朝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益加强，原来借用蒙文进行交际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齐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无圈点满文”，后人称之为“老满文”。这是满文创制之始。老满文是把满语音义和蒙古文字合为一体，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但新创制的老满文毕竟有其局限性：“字体简古，辨认殊难，声韵既不完备，书法亦未尽画一”（张玉全：《述满文老档》）。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改革老满文：“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稗益矣。”（《清太宗实录》卷十一）达海在原字母旁增加圈点，并吸收汉语语音成分，创制了新字母，使满文音体结构更臻完备，满语词汇愈益丰富。经达海改进的满文，后人称之“新满文”。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文被定为国语，满文（也称清文）被奉为国书。清朝政府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及国内颁行的重要文告和上下行文件等也必须有满文文本。康熙、乾隆时期，满文进一步规范化。这个时期，满族贵族和八旗子弟都要学习满文。同时，一些满文工具书和语法书也相继问世。但是道光以后，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满语、满文逐渐停止了发展，日趋没落。

有清一代，用满文书写了大量公文，特别是清代前期康、雍、乾三朝，满文档案数量最巨。同时，也用满文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清朝留下来的大量满文文献，是清朝历史的见证，它涉及清朝内政、外交诸方面，是一笔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满文档案浩如烟海。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两朝九百余万件档案中，就有一百五十万件左右的满文档案（不包括满汉合璧的档案）。此外，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图书、档案、科研等部门也保存相当数量的满文档案、图书。这些满文文献，犹为稀世珍宝，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整理和翻译这些满文文献，一方面为研究清史、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十分必要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满文发展规律的一条必由之路。

当然，今天我国个别地区还有为数很少的人能讲满语。这种满语是从女真语经过长期发展而保留下来的，对它进行抢救和科学研究也是必要的。

解放前，我国对满文文献的学术研究十分薄弱，满文的专业人才亦屈指可数。一九一八年清末进士金梁在沈阳故宫崇漠阁发现《满文老档》，即请人翻译，后以《满文老档秘录》为题发表过部分译文。该译文错误颇多，质量不高。到了三十年代，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对《满文老档》曾进行过整理。其中李德启、张玉全二位先生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他们相继在《文献特刊》和《文献论丛》上发表过论文。其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微乎其微了。

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满文专业人才的培养。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举办过两届小型满文

学习班，由七十四岁高龄的蒙古族老先生克敬之任教。一九五九年克老先生因病去世后，鲍育万、张玉全、关振华、钟棣华、赵玉麟、徐长胜等诸位先生也都为培养满文人才出过力。尤应指出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抢救濒于失传的满文，为培养满文专业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九六一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开办本科满文专业，学制五年，培养学生二十一人。这是我国大学培养的第一批满文专业人才。这些人现在正当中年，他们在北京、辽宁、吉林等地从事专业工作，已成为我国满文文献整理和满文研究的骨干力量。一九七五年，周总理又亲笔批示，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举办了满文干部培训班，培养了二十名专业干部。近年来，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有关部门也都相继开办过小型满文学习班。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现将满文纳入科研规划，东北师大也计划在研究生中培养满文人才。智力投资，培养人才，这是我们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和保证。满文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党和政府的深谋远虑。这些播下去的种子，现在已经开花结果。我国的满文研究和满文文献的整理呈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近年来，我国满文档案文献的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满文老档》是一部清入关前用满文撰写的唯一官撰编年体史书。这部史书价值珍贵，是研究早期满族社会历史以及满族语言文字的第一手资料。六十年代，台湾大学广禄和李学智合作对《满文老档》进行过整理和研究，并出版了《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等译著。一九七八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合作，对《满文老档》作了全面的译注，不久即将出版。我国一些清史学者借助《满文老档》对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经济形态、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研究，写出了一些有见解、有深度的专著和论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专业人员近年来还翻译了数百万字的满文档案，其中有《俄罗斯档》、《国史院档》、《玉蝶》、《郑成功档案史料》、《锡伯族西迁档案史料》以及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满文档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满文专业人员还翻译了《盛京刑部原档》以及反映清代中越关系的《使交纪事》，即将出版。《顺治年间档》即顺治四年至八年盛京管内务府事务佐领的满文档案，已由中央民族学院和辽宁省博物馆的满文专业人员翻译公布。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的满文专业人员选译了《黑图档》中康熙朝的《盛京庄园档案史料》，即将出版；此外，还合作翻译了《三姓副都统衙门档》中的几个专题档案史料。以上这些档案史料反映了清代某些方面、某些地区的政治制度、军事设置、经济状况、八旗制度、少数民族、人民斗争、沙俄侵华等内容，有一定学术价值，是研究清史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在整理、翻译这些档案史料的同时，还写出了一些论文，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

除满文档案外，满文图书和碑刻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一九七九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纂了《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将北京十三个单位的满文藏书合编一目，共814种。《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凡642种。辽宁省图书馆最近也对满文图书进行了分类整理。

满文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近年来也有新的进展。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著的《满文文法》一书，即将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即是几年来满文翻译、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又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吉林东北师大明清史教研室的满文专业人员编写了《满语语法》讲义，已印刷发行。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满文工作者还正在编写《满汉辞典》等书。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满文专业人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撰写了探索满文文法规律的论文。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满文工作者就满文诗歌的语言特点和规律作了可喜的研究。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沈阳故宫博物馆的满文工作者对原有的《清语摘抄》作了改造和补充，合编了《新编清语摘抄》，以便利用和查阅。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的穆烨骏先生撰写的《基础满语概论》、《满语文法会要》、《满语地名翻译中的若干问题》等著作，提出了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对东北地方满语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我国在满文方面所取得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近年不少著名的满文学者，如日本的神田信夫、冈田英弘、松村润、细谷良夫，西德的马丁·嵇穆、蒙德，丹麦的麦耶女士，英国的纳尔逊等，先后来我国访问，同我国学者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彼此增进了了解。

总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满文科研队伍，其中一大批中青年同志已成为骨干力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满文文献的发掘和满文的科研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完全相信，经过满文专业人员的不断努力，一定会填补某些空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台湾清史研究一瞥（续二）

戎　笙

五、对清史中若干重大问题的观点

台湾实行戒严令已三十余年，一切结社集会的自由，均遭禁止，警察有紧急逮捕权。报刊杂志都要接受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检查，稍不如意，即予查封。在这种戒严体制下，对于清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一些政治敏感性强的问题，始终处在禁锢之中。在史学方法论上，不少学者主张“历史是科学”，有的甚至说“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有的学者还说：“史学所争者为真理，史学家须富有实事求是之科学精神，然后史学之价值始显”。但在那种政治体制下，这些主张是难以实现的。历史学在实际上成为台湾当局的“政战”工具，严格地从属于政治。被奉为正史的《清史》，由研究政略战略的最高机构“国防研究院”主持，就是明证。台湾“国防研究院”主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其昀在《清史》序中说：“深以政治战、文化战之重要，实不下于兵战，得此凭藉，于是筹修清史”。张其昀的话表明，筹修清史的目的，在于适应“政治战”的需要。有人在讨论史学方法论时提出，“我们应该根据三民主义提出我们自己的一套解释才行”。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曲解历史的事例比比皆是。由学术观点而引起诉讼，或导致报刊查禁，或由警备总部出面干预，这样的事也发生不少。如1972年台大历史系教授林瑞翰被控诬蔑岳飞案，1977年由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定谳的郭寿华诽谤韩愈案，以及马沙沟考证孙中山临终时只说过“和平，奋斗，救中国！”没有说过“介石，介石！”而遭致刊物查禁案，是较为著名的案例。在“诬岳案”结案之后，退休的史学教授沈刚伯感慨地说：“古今知识分子都是‘可怜虫’！”“中